

烟台故事

# 思郭堂

撰文/供图 冯宝新

乡村记忆

## 余米余粮往事

孙瑞

民以食为天，食以粮为先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在老一辈农村人的记忆深处，“余”“祟”两个字在生活中高频率使用。有趣的是，“余祟”两字共用根基，底部皆是“米”字，记录了粮食的流通过程，记述了农人顺应天时的智慧。

余(dí)，入米为余，意为买粮；祟(tiào)，出米为祟，意为卖粮。如今，在一些老年人的口语中，依然保留着这两个字的原始叫法。

小时候，不懂“余”“祟”字的含义，只听到一些年长者，经常唠叨余米祟粮那些陈糠烂谷的往事。

我们村子坐落于丁字湾畔，过去主要农作物是地瓜、玉米、小麦、大豆、花生。记得当时有这么一句顺口溜，庄稼不收饿肚子，天干水涝熬日子。

“老姑，明儿我去赶集，祟点粮食，需要捎点啥，您说一声。”“那就帮我余点小米吧？老四快降生了，以备坐月子用……”“未雨绸缪”的母亲说。眼前这位唠嗑的人，我称他“二侄”，自留地和我家紧挨着。

我母亲因住娘家门，在村里辈分最大，很多村民称她老姑。父亲当时在县委工作，两个月只能回家一次，家里所有的农活、家务活全靠母亲一人干。当时，母亲怀孕已十个月，即将临产，因为家里没有劳力，只好挺着大肚子，从河里挑水浇自留地的大白菜。

那时的集市，是粮食流动的血脉。空气中弥漫着谷物干燥后的清香，混合着牲口的体味和人群的嘈杂。

二侄在集市上祟完了自己的粮食后，来到小米摊位，左看右看，小心翼翼地捧起一把金黄色的小米，放在指尖捻搓，对着阳光细看成色，再凑近闻一闻是否是新米。小米颗粒金黄温润，藏着阳光与土地的馈赠，满是质朴醇厚的烟火香气。

小米粥过去是那代人坐月子唯一标配。三弟出生后，母亲吩咐我把小米淘洗了两遍，水和米1:6比例煮粥，最后再放上几颗大枣。大约半个小时，一碗熬得恰到好处的小米粥，色泽金黄温润，浮着一层醇厚米油，清醇的米香漫散开，入口绵柔顺滑，暖胃又养人。小米粥具有养精蓄锐、调节元气、滋补身体的功能，母亲靠它补给营养，恢复体力。

过去，祟粮的，一股多是自家有余粮的农户，余粮的，则是

像母亲这样急需口粮短缺的庄稼人。也有家口大，家里粮食不够吃的，把精粮运到集市上兑换粗粮。祟精粮，余粗饭，庄户人家度日算；祟千升，余百斗，算计不到要受穷。这是当时经常挂在人们嘴边的一句谚语。

余入的粮食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将变成餐桌上的窝头、箕馏，支撑起一家人度过漫长的寒冬。我参与余粮活动“出道”较早，十二岁时跟着母亲赶集余米祟粮。

1976年，家里盖了四间大瓦房，那时谁家盖房全靠邻居帮忙，没有“雇工”这个说法。像拉石头、运砖，乃至挖地基、垒墙、上梁等，乡亲们都一律不收工钱，当时只要管饭就行了。

为招待好帮工们，家里把平时积攒的小麦做成馒头，顿顿招待帮工。生产队分的二百斤麦子，哪里经吃，到了年底，囤里小麦已经捉襟见肘。幸好，家里刚刚卖了一头猪，有了一些零花钱，母亲只好带着我到集市上余点小麦，过年包饺子、蒸饽饽。

过年蒸饽饽是年俗文化重头戏，是腊月忙年的重要仪式，寓意日子蒸蒸日上、阖家团圆，饽饽既用来祭祀供奉，也作为走亲访友的年礼。

腊月的乡村大集，赶集的人络绎不绝，热闹非凡。路的两侧全是蹲立着的粮食口袋和它们的主人，或玉米或小麦或地瓜干或小米等。粮食口袋上口一律都敞开着，目的是将所出售粮食的成色质量予以展示，便于余粮食者任意挑选。

母亲来到麦子摊位前，看到籽粒饱满匀净，色泽金黄温润小麦，顺手抓了几粒放在嘴里，用牙一咬，发出“咯嘣”的响声，这声音预示着小麦干、成色好。

经过几番讲价，过完秤，最后成交。母亲付了余粮食的钱，剩下的零头又塞入衣兜最里层，小心翼翼地用别针别好。

最后，我负责用小车把余的几十斤小麦，一路欢歌推回家。年三十，一家人如愿以偿吃上白面饺子。

弹指一挥间，如今的百姓餐桌，早已实现跨越式改善。超市里、集市上的米面琳琅满目，扫码即得，再也无须经历那般艰辛的“余粮”过程。然而，“余”字所承载的记忆并未远去。它提醒着我们，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，背后是农人的辛勤耕耘，是父辈的负重前行，更是国家对粮食安全的深远谋划。



思郭堂外景 资料片

毓璜顶南坡，曾有一栋中西合璧的三层楼房，灰墙、坡顶、木楼梯，脚步踩上去会咯吱咯吱地响。

楼名起得雅致，叫“思郭堂”，1922年由益文学校历届校友集资建成。新校舍落成时，人们用这三个字想念那位四十多年前在山坡上办学堂的外国人。

他就是美国传教士郭显德博士。1864年，郭显德来登州传教，1866年在毓璜顶东北麓创立“文先”书院。这座烟台开埠后第一所新式学校，曾几易其名，数度改制，先后经历文先书院、会文书院、实益学馆、益文商专……

这所新式学校系教会学校出身，发轫于晚清，兴盛于民国，由私立而公立，由小学而中学而专科，至今日便是省级重点中学烟台二中。

而那座思郭楼，历经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，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不得不拆除重建。老楼消失了，但思郭堂承载的烟台近代教育与红色革命的厚重记忆没有消失。

那是一段革命者不得不隐忍缄默、重新积蓄力量的艰难岁月。

1927年，大革命失败了。初夏，一个叫徐约之的青年，从武汉发生的“七·一五”反革命政变中脱险，辗转回到烟台。他曾是“益文商专”的学生，到外地读书后加入了共产党。如今，他返回烟台母校，一边读书，一边“播火”。

1928年5月，他与益文商专同窗许端云在母校“益文”思郭楼，共同建立了烟台城区第一个党支部，并担任支部书记。思郭楼成为中共烟台党支部秘密活动地点，也成为烟台革命的摇篮。

1929年，许端云主编办起了烟台第一份共产党的报纸——烟台市委党报《胶东日报》，成为传播革命声音的重要阵地。

1930年春，徐约之被党组织派往青岛，25岁的许端云被任命为中共烟台市委第一任书记。1931年被国民党逮捕并押赴济南杀害，年仅二十六岁。

他牺牲了，但种下的那颗火种，在这栋楼里，一直没有停止生长。今天，这粒火种有了一个叫“红润益文”的名字。

芝罘区二马路东山花园广场，立着许端云的汉白玉半身像，黑色大理石基座正面刻着党徽和生平，基座与雕像之间的四周，雕着二十六朵梅花。

二十六个花瓣，二十六年人生——梅花不是装饰，是一个算法：一个人可以把命给出去多少。

这所学校的革命摇篮史，从这样一笔一笔写起的。

这个摇篮从百年前的思郭楼出发，走过一百多年风风雨雨，走上状元坡。如今的烟台二中，有三个校区——芝罘、莱山和高新，教职工近七百人，在校生过万人。

重新修建的思郭堂，仍安静地矗立在那里，墙体上有旧的爬山虎，也有新抽出的嫩芽。

自1864年开始的记忆不曾被忘却，被学校小心翼翼地收在几个地方：文化长廊、“五史”展厅、复兴长阶、党员活动室。在二中高新校区里，有三条长廊——“胶东红色文化长廊”“红润益文党建长廊”“烟台开埠文化长廊”。

现任校党委书记、校长王晓波说，要把抽象的价值变成“可触摸的载体”，把身边的地域历史文化资源变成课程建设的“活教材”。

2021年5月，校园里新挂一块“烟台市党史学习教育阵地”的牌子，全市教育系统第一个。烟台市委党史研究院的专家们来了，还给师生送来一箱箱党史书。

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，退休老干部回校讲校史，讲到徐约之、许端云；校领导带头讲党史；思政教师讲时政；语文教师讲红色故事；历史教师讲革命往事；艺术教师把红色作品唱成歌。九十余场讲座，听众上万人次。

今年，这所学校就160岁了。1926年，第一任中国校长罗希偌把“诚、勤、爱”三个字定为校训。如今，这三个字仍然镌刻在校门上，“诚、勤、爱”的底色与“红润益文”的旗帜，在同一所学校里互相扶着走。

那座诞生了党支部的老楼，一百年前摇出来的是一群压低声音谈真理的年轻人；一百年后，摇出来的是一个个英才，一批批让党放心、爱国奉献，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。